



SLAVOJ ŽIŽEK

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斜目而视

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季广茂 译

斜目而视
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 / (斯洛文尼亚) 齐泽克著；
季广茂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 (2011.5 重印)
书名原文：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ISBN 978 - 7 - 308 - 08320 - 1

I. ①斜… II. ①齐… ②季… III. ①拉康, M. L.
(1901 ~ 1981)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0497 号

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季广茂 译

责任编辑 丁幸娜

装帧设计 丁威静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34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8320 - 1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中文版前言

《斜目而视》原书出版已近二十年。尽管其中的许多段落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批判性回应，但我坚持认为，本书的基本方法依然正确无误（对希区柯克电影的分析在本书中占很大比重，本书的基本方法就是以这些分析为例来证明的）：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剔除希区柯克电影中的叙事内容，只留希区柯克电影的高强度的形式模型（formal pattern）。如果我们要对希区柯克的电影进行严肃的社会批评性的解读（socio-critical reading），我们也理应仔细辨析早已渗入纯粹形式层面的社会调停（social mediation）。所以，请允许我为本书中的分析增加一个新例证，向大家表明，隐含的社会调停是如何维系形式悖论（formal paradoxes）的。希区柯克研究有一个略显琐碎却又极具启示意义的特性：事实性错误不胜枚举，错误率远远高于电影研究错误（已经很高）的平均水平。这些错误既涉及电影的叙事因素，又涉及电影的形式特征：有些人先是不厌其烦地描述主观镜头、客观镜头以及主客观镜头的剪接，继而提出自己的论点，不过，如果根据录像带或 DVD 一一核实，我们就会吃惊地发现，那些描述错得一塌糊涂。建立在这些错误上的理论分析通常清晰易懂，所以，我们不得不采取这样一种被（错误地）归于黑格尔名下的态度：“如果事实与理论不符，理论固然不好，事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知错而不改，这方面有一个杰出的范例，它涉及《眩晕》中一个最为著名的场景：那是一个充满魔力的时刻，在厄尼餐厅，

斯考蒂（Scottie）第一次看到了马德琳（Madeleine）。^① 确切些说，这里的错误与两个镜头的性质有关。

我们先是从外面看到了厄尼餐厅的入口，然后镜头切到了斯考蒂。他坐在位于餐厅前部的吧台边上，透过一道门框向挤满了桌子和客人的大房间张望。于是，一个没有剪切的长长的摇镜头把我们带到左侧，给我们提供了整个房间的全景，声音则是繁忙餐厅里常有的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我们应该记住，这显然不是斯考蒂的主观透视。突然间，我们（或者说，摄影机）的注意力被引向一个诱人的焦点，一个牢牢锁定我们目光的符咒（*fascinum*），一个明亮耀眼的斑点。我们很快认出，那是一个漂亮女人的裸背。这时，赫尔曼^②的动情音乐徐徐而起，压倒了背景的嘈杂声。在音乐的伴奏下，摄影机渐渐移向那个符咒。我们先认出了面对着我们的马德琳的丈夫厄尔斯特（Elster）。我们由此推断，那个女人肯定是马德琳。在这个远景之后，镜头切到了正在偷窥马德琳的斯考蒂，然后又切成了斯考蒂的主观镜头，切到了他看到的场景（马德琳用上衣遮住后背，准备离开）。在马德琳和厄尔斯特离开餐桌并从斯考蒂身旁走出餐厅时，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著名的镜头。斯考蒂看他们走近了，为了不暴露身份，把目光转向了酒吧门框对面的玻璃上，悄悄偷窥背后发生的一切。马德琳在走近他时，不得不短暂地停留一下

① 我在这里采用的是让-皮埃尔·奈斯昆奈兹（Jean-Pierre Esquenazi）的《希区柯克与〈眩晕〉的探险》（*Hitchcock et l'aventure de Vertigo*），Paris: CNRS Editions 2001, p. 123-126。

② 伯纳德·赫尔曼（Bernard Herrmann, 1911—1975），美国音乐家，以为电影配曲著名。与希区柯克关系密切，曾为《惊魂记》、《西北偏北》、《知情太多的人》和《眩晕》配曲。还曾为《公民凯恩》（*Citizen Kane*）、《恐怖角》（*Cape Fear*）和《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配曲。——译者注

(那时她丈夫正跟侍者交代什么事情)。这时，我们看到了她神秘莫测的侧影。(侧影总是神秘莫测的，因为我们只能看到面部的一半，面部的另一半可能变形丑陋，令人生厌。或者说，我们其实看到的，只是朱蒂“真实”而普通的面部。我们后来得知，这个女孩正在假扮马德琳。)这个诱人的镜头也不是斯考蒂的主观透视。厄尔斯特与马德琳会合后，一起离开斯考蒂，并走近餐厅出口。只是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到了他的主观镜头(他眼中的马德琳和厄尔斯特)。这个镜头是他坐在吧台边上的那个镜头的反镜头(counter-shot)。

在这里，主观镜头与客观镜头的暧昧不明至关重要。只要马德琳的侧影并不出自斯考蒂的主观透视，那我们只能说，她的侧影镜头被彻底主体化了。它表现的不是斯考蒂实际上看到的，而是他想像出来的。也就是说，那是他幻觉性的内在视境(inner vision)。(不妨回想一下，在我们看到马德琳的侧影时，由餐厅墙壁构成的红色背景似乎更加热烈，它几乎就要因为热烈而爆炸，就要变成黄色的烈焰了。仿佛他澎湃的激情已经直接铭刻于背景之上。)也难怪，尽管斯考蒂并没看马德琳的侧影，但从他的行为判断，仿佛他已经被这个侧影所捕获，深深为之吸引。这两个镜头虽然已经主体化，但无法把它们归诸任何主体。我们从这两个镜头中得到的，正是**纯粹的前主体现象**(pure pre-subjective phenomenon)。马德琳的侧影是纯粹的假象，充满了丰富的力比多投入(libidinal investment)。从某种意义上讲，因为过于主体化和过于强烈，这样的力比多投入是任何主体都无法承受的。

我们从这种主体性过剩(excess of subjectivity)中两次看到的是同一运动。它不属于电影理论所谓的“缝合”(suture)这一标准手法，即客观镜头(某人在看什么东西)与主观镜头(某人看到的

什么东西)进行转换的标准手法。通过这样的“缝合”，过剩被驯服了，被明确置于主观-客观的镜像关系(subject-object mirror relationship)之内，如同客观镜头和主观反镜头(counter-shot)的转换所例证的那样。为了抹除这种“没有主体的主体性镜头”(subjectless-subjective shot)呈现出来的强烈情感，展示某种“没头没脑的激情”(acephalous passion)，从唐纳德·斯波托^①到罗宾·伍德^②以来的多数阐释者，都在详细描述厄尼餐厅的场景时莫名其妙地坚称，这两个过剩镜头表现的均为斯考蒂的主观视野。这样一来，过剩即遭遇制和简化，被置于客观镜头与主观镜头进行标准转换的层面。

我们在这种过剩中遇到的，则是“作为客体的凝视”(gaze as object)，它脱离了将它系于某个特定主体的束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全都遇到过这样的古怪时刻。那是在我们瞥见了自己的影像，而这种影像并没有回视我们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脑袋的一侧长了个奇怪的东西，我想借助于两个镜子看个究竟。突然间，我从侧面看到了自己的面部。这个影像复制了我全部的姿势，但它是以其怪异的方式复制出来的。

正是在这样的离奇经历中，我们把握到拉康所谓的“作为小客体的凝视”(gaze as *objet petit a*)的精髓。“作为小客体的凝视”只是我们影像的一部分，只是它躲开了镜子般的对称关系。当我们从自己身外审视自己，从某种不可能的角度审视自己，就会造成某种

① 唐纳德·斯波托(Donald Spoto, 1941—)，美国传记作家，天主教神学家，还做过修道士。曾为许多名人树碑立传，传主包括希区柯克、劳伦斯·奥立弗(Laurence Olivier)、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英格丽·褒曼、伊丽莎白·泰勒、玛丽莲·梦露、奥黛丽·赫本等。——译者注

② 罗宾·伍德(Robin Wood, 1931—2009)，生于伦敦，活跃于加拿大，电影批评家，对希区柯克、英格玛·伯格曼所论甚精。——译者注

创伤。造成创伤的原因并非我被客体化了，被简化成了供人注视的外在客体；造成创伤的原因在于，被客体化的正是我的凝视，它从外面观察我。这意味着，我的凝视不再属于我，它是从我这里偷走的。小客体的这种古怪特性，会导致意想不到的时间性后果（temporal consequences），它把我们带回到希区柯克那里。让-皮埃尔·迪皮伊^①在其有关《眩晕》的令人钦佩的文本中，展示一个时间性的逻辑悖论（temporal logical paradox）：

一个客体具有属性 x ，直至时间 t ；过了时间 t ，不仅该客体不再具有属性 x ，而且认定在任何时间内该客体曾经具有属性 x ，都是不真实的。因此，命题“在 t 这一顷刻，客体 O 具有属性 x ”的真值，取决于这个命题是在哪个时刻提出来的。^②

我们应该在此注意下列精确的概括：并不是说，命题“客体 O 具有属性 x ”的真值取决于这个命题里面提到的时间——即使里面提到了具体的时间，这个命题的真值也只取决于提出这个命题的时间。或者，引用迪皮伊文本的标题来说，“在我即将死去之时，我们所有的浓情蜜意都从来不曾存在过”。想一想结婚和离婚那档子

① 让-皮埃尔·迪皮伊（Jean-Pierre Dupuy，1941—），巴黎综合理工大学（École Polytechnique）社会政治哲学教授，主要研究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理论、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认识论。主要著作包括《自欺与理性之悖论》（*Self-Deception and the Paradoxes of Rationality*）、《心灵的机械化》（*The Mechanization of the Mind*）等。——译者注

② 让-皮埃尔·迪皮伊（Jean-Pierre Dupuy），《在我即将死去之时，我们所有的浓情蜜意都从来不曾存在过》（“Quand je mourrai, rien de notre amour n'aura jamais existé”），未刊稿，来自“《眩晕》与哲学”研讨会，高等师范学校，巴黎，2005年10月14日。

事吧：为离婚的权利所做的最具才智的论辩（正是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做出了这样的论辩），并不提及庸常的世俗之见，说什么“和所有的事情一样，爱情的依附（love attachments）也不是永恒的，也会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等等；相反，它会承认，婚姻观里面存在着不可溶解性（undissolvability）。结论就是，离婚总有回溯性的余地（retroactive scope）：这不仅意味着婚姻现在已被废止，而且意味着更为激进之事，那便是，婚姻之所以理应废止，是因为它从来都不是真正的婚姻。

并不求助于时间旅行而能回到过去，并改变过去，这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已由亨利·柏格森^①提供：我们当然并不

①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法国哲学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提出“创化论”，强调创造与进化并行不悖。相信宇宙中存在着“生命冲力”，世间一切皆有活力。反对机械论和决定论。齐泽克曾经在别处提及他。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中，柏格森描述了他于1914年8月4日（法国和德国在那一天正式宣战）生出的怪异感：“尽管我心凄惨，尽管面临战争，甚至是一场可能获胜的战争，但我依然觉得，这是一场灾难……谁又会这么想，如此可怕的事件真的会轻而易举地发生？”在战争爆发之前，战争既是或然性的，又是不可能的；战争一旦爆发，战争刹那间成为现实的和可能的。“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谁能把此时此地的现实拉回到过去之中，逆时间而动。不过，毫无疑问，可以把可能性拉回到过去之中，或者说，无论何时，可能性都会把自己拉回到过去之中。就不可预言的新现实的形成而论，现实的意象是在现实发生之后，在模糊的过去中反射出来的：这个新的现实会发现，它始终都是可能的；但只是到了真正形成的刹那，它才开始成了它过去一直可能成为的样子。所以我才说，只要这一现实形成，并不先于其现实的可能性就会一直先于其现实而存在。”齐泽克认为，这表明，我们总是与作为不可能的实在界擦肩而过：或者把它体验为不可能的和不真实的（无论我们多么清楚，即将来临的灾难是完全可能的，但我们还是不相信它真的会如期而至，因而将其作为不可能性排除出去），或者把它体验为真实的和不再不可能的（一旦灾难降临，它就被“重新常态化”了，被视为事物的常态运作的一部分，视为一直总是已经可能发生的事情）。让-皮埃尔·迪皮伊说得最清楚，使得这些悖论成为可能的，是“知”与“信”的分裂：我们知道灾难是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但我们不相信它真的会发生。——译者注

能真的改变过去的实际存在，但我们可以改变的，是过去的虚拟维度（virtual dimension）。也就是说，一旦出现了真正的新事物，它会回溯性地创造它自身的可能性，设置它的原因和条件。可以把潜在性（potentiality）插入（或拔出）过去的现实。坠入情网就改变了过去：仿佛我总是已经在爱着你，仿佛我们的爱情总是已经在命中注定，即所谓的“实在界的应答”（answer of the real）。我们现在的爱情导致了过去的存在，虽然过去催生了我们的爱情。“合法政权”（legal power）也是如此：在这里，同样也是共时性先于历时性。一旦我偶然坠入情网，爱情就成了我的宿命；同样，一旦形成了合法的秩序，它的偶然性起源就必须遮掩。一旦它出现在这里，它就总是早已出现在这里了。有关它的起源，每个故事都是神话，与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讲述的有关语言起源的故事无异：结果已经被预先假设。

在《眩晕》中，发生的事情与此完全相反：过去被改变了，所以它才丧失了小客体。在《眩晕》中，斯考蒂首先经历的，是他丧失了他爱得要死的情人马德琳。他要在朱蒂身上重塑马德琳，却发现他早已熟知的马德琳正是朱蒂，以前的马德琳是她假扮的。这时，他发现秘密并不在于，朱蒂是假的（他知道她不是真的马德琳，因为他要在她身上重塑马德琳），而在于，**因为她并不是假的，她就是马德琳，所以马德琳早就是假的。**小客体解体了，真正的丧失是丧失了丧失，我们得到的是“否定的否定”。他的发现改变了过去，剥夺了小客体已经丧失了的客体。

如此说来，今天的伦理 - 司法保守派（ethico-legal neoconservatives）岂不是有点类似于《眩晕》中的斯考蒂？他们要重建已经丧失的过去，要在如今杂乱而平庸的朱蒂身上重塑高贵而典雅的马德

琳，但或早或迟，终有一日，他们会被迫承认，要让马德琳（古老的传统民德）死而复活，是根本不可能的。马德琳早已就是朱蒂，他们在现代悲观的、世俗的、自私的社会中极力清除的腐败堕落，早就存在了。这类似于禅宗佛法（Zen Buddhism）。有些人对禅宗在西化新时代的形象和修行大加批评，认为如此形象和修行使禅宗沦为“松弛之法”，这是对日本真正的禅宗的背叛。这些人在这样做时，抹杀了一个事实：他们现在大加批判的西化禅宗的那些特性，其实早已存在于日本“真正”的禅宗之中：二战刚一结束，日本的禅师就立即行动起来，为商业经理人员开设禅宗课程；二战期间，这些商业经理人员大多支持日本的穷兵黩武。

如果是真正的爱情，斯考蒂会在发现真相后，把朱蒂当成“比马德琳本人还要马德琳”的人，并接纳她（在女修道院长出现前，他真的接纳了朱蒂）。在这里，迪皮伊的观点应该予以纠正。迪皮伊的看法是，斯考蒂应该把马德琳留在过去。没错，但是，在发现了朱蒂就是马德琳之后，他又该怎么做呢？过去的马德琳是假想的诱惑物，装扮成了她本不是的人（朱蒂扮演了马德琳）。现在朱蒂在扮演马德琳时表现出来的，是真正的爱。在《眩晕》中，斯考蒂并不爱马德琳。这样说的证据就是，他要在朱蒂身上重塑马德琳，改变朱蒂的特点，使她与马德琳相像。其结果就像马克思兄弟的一个笑话：“你身上的一切都令我想到了你，你的嘴唇、头发、胳膊、腿……你身上的一切，除了你本人。”人不会像自己，人就是自己。难怪可以把《眩晕》解读为马克思兄弟的拉韦利笑话的一个变体：“你让我想起了伊曼纽尔·拉韦利（Emmanuel Ravelli）。”“可我就是伊曼纽尔·拉韦利呀。”“难怪你长得那么像他。”难怪朱蒂像马德琳，她就是马德琳。这也是下列想法令人反感的一个原因：父母

一旦失去了孩子，就去克隆一个。如果父母为此心满意足，他们对孩子的爱就不是真正的爱。爱之为爱，并不在于爱客体的属性，而在于爱客体身上深不可测的未知数（abyssal X），即难以言表之物（the *je ne sais quoi*）。

在《知识与良知》（*Wissen und Gewissen*）中，维克多·弗兰克尔^①谈到了一个病例。二战之后，他接收了一位患者。他是集中营的幸存者，战后与妻子重逢。不过，因为在集中营感染了疾病，她不久去世。这位患者感到痛彻肺腑的绝望。弗兰克尔竭尽全力，要把他从沉滞中解救出来，但无功而返。直到有一天，他告诉他：“假如上帝赋予我力量，我凭借这力量能够创造一位女性，她具有你死去的太太的所有属性，无人能把她们区分开来，你会请我创造这样的女性吗？”患者先是沉默，接着站起来说：“不会的。谢谢你，大夫！”然后是握手、离开并开始了新的正常的生活。^② 这位患者做到的，正是斯考蒂无法做到的（他要重新创造出同一位女性）：他意识到，虽然人能找到积极属性完全相同的女性，却无法重新创造她身上深不可测的小客体。

有一个短篇科幻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几百年后，时间旅行已经可行。那时有一位艺术批评家，他是如此痴迷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纽约画家的作品，以至于从几百年后回到现在，与他相

① 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 1905—1997），奥地利神经病医师和精神病医师，大屠杀的幸存者，存在主义心理疗法（logotherapy）的奠基人。著有《人对意义的探寻》（*Man's Search for Meaning*）。该书记录了他在集中营的经历。他认为他的心理疗法可以在所有的生存形式（包括最肮脏的形式）中发现意义，找到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他的理论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有颇多启示。——译者注

② 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知识与良知》（*Wissen und Gewissen*），Frankfurt: Suhrkamp, 1966。

会。不过，他发现，这位画家是个毫无价值的酒鬼，他甚至偷走了艺术批评家的时间机器，逃进了未来。艺术批评家只好留在现在的世界上，画出那些所有令他痴迷的作品，而正是这些作品使他从几百年后回到了现在。令人吃惊的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早已使用过同样的情节。《对过去的感知》（*The Sense of the Past*）是在詹姆斯的故纸堆里发现的手稿。它发表于1917年，那时詹姆斯已经去世。它讲述的故事与《眩晕》讲述的故事有些离奇的类似，并引发了斯蒂芬·史本德^①和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明察秋毫的阐释。[迪皮伊注意到，詹姆斯是威尔斯（H. G. Wells）的朋友，《对过去的感知》是威尔斯的《时间机器》（*Time Machine*）的翻版。]詹姆斯死后，这部小说改编成了戏剧《伯克利广场》（*Berkeley Square*）并取得了成功。该戏剧于1933年改编成了电影。在电影中，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扮演年轻的纽约客拉尔夫·彭德尔（Ralph Pendrel）。彭德尔继承了一所房子。房子位于伦敦，建于18世纪。他在房内发现了一幅肖像，画的是一位也叫拉尔夫·彭德尔的远祖。他深深为这幅肖像所迷，于是迈过一道神秘的门槛，发现自己回到了18世纪。在那里，在他见到的各色人等中，有一位画家，他就是令他痴迷的那幅肖像的作者。当然，上面画的就是他本人。博尔赫斯在做出评论时，对这个悖论做了简洁的概括：“原因晚于结果，航行的动机是航行的结果。”詹姆斯为这次历史之旅增添了爱情的内容：回到18世纪之后，拉尔

^① 斯蒂芬·史本德（Stephen Spender, 1909—1995），英国诗人、小说家和散文作家。最关心的主题是社会正义和阶级斗争。著有诗集《九个实验》（*Nine Experiments*）、小说《神殿》（*The Temple*）、散文集《上帝败了》（*The God that Failed*）等。——译者注

夫爱上了奈恩（Nan），她是他（18 世纪的）未婚妻莫莉（Molly）的妹妹。奈恩最终意识到，拉尔夫是来自未来的时间旅行者，于是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帮他回到了他自己的时代，回到了奥罗拉·科因（Aurora Coyne）的身边。奥罗拉·科因先前拒绝了拉尔夫，但现在接受了他。……这个故事只是以精神错乱的形式，使符号精神机制的循环（circle of symbolic economy）神秘化了。在那里，结果先于原因。也就是说，结果回溯性地创造了原因。

而且，令人惊奇的是，在康德的法哲学中，这道理同样适用于对（合法）政权进行反叛这一行为的法律地位：如果反叛正在进行，命题“反叛者的所作所为是理应受到惩罚的犯罪行为”就是真的；但是，一旦反叛大功告成并建立了新的法律秩序，这个有关过去行为的陈述就不再有效。“有些人被动员起来，努力摆脱所谓暴君的枷锁。对这些人而言，反叛是合法的手段吗？”^① 康德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

人民的权利受到了伤害；暴君一旦被废，无论如何对待暴君，都没有什么非正义可言。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如此，如果臣民要以这种方式寻求自己的权利，那就是大逆不道之罪。如果他们斗争中失利并因此遭受最严厉的惩处，他们不能抱怨自己受到了非正义的待遇，正如他们一旦成功，暴君不能这样抱怨一样。……如果人民的反抗成功，先前所言依然适用于下列事实：首领一旦退位，重新成为黎民，他不能为了恢复统治而发起反抗，但也无须担心，自己要为先前对国家的管制承担责任。

① 来自互联网，见：<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kant/kant1.htm>

伯纳德·威廉斯^①提出过“道德运气”（moral luck）之说。康德在这里提供给我们的，不正是康德版的“道德运气”或“法律运气”（legal luck）？作为一种行为，反叛的（法律的而非伦理的）地位是回溯性地决定的：如果反叛成功并确立了新的法律秩序，它就会设置自己的循环论证（*circulus vitiosus*）。也就是说，它会在本体论空白（ontological void）中抹除自己的非法起源，就会制造悖论，即回溯性地设置自己。在上面那段文字的前面（与之相距几个页码），康德更为清晰地表述了这个悖论：

如果由恶劣的宪法导致的暴力革命通过非法手段引入了更为合法的宪法，那么，引导人民回到先前的宪法就是不允许的。但是，随着革命的持续，每个公开或秘密涉及革命的人都会因为那些反叛者而受到公正的惩罚。

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行为是一样的行为，但它的法律地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反叛还在进行时，它是理应受到惩罚的犯罪；但在新的法律秩序建立之后，反叛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说得更确切些，作为在结果中回溯性地删除/抹杀自己的隐匿调停者（mediator），它销声匿迹了。这道理同样适用于脱胎于暴力性“自

① 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1929—2003），英国道德哲学家，被《泰晤士报》称为“他那个时代最杰出和最重要的道德哲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在英国空军服役，1967年开始在英美大学出任哲学教授。主要著作包括《自我问题》（*Problems of the Self*，1973）、《道德运气》（*Moral Luck*，1981）、《伦理学与哲学的极限》（*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1985）和《真理与真实》（*Truth and Truthfulness: An Essay in Genealogy*，2002）。——译者注

然状态”的法律秩序的形成。康德已经充分意识到，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契约”的历史时刻：公民社会的团结与法律是由暴力强加于人民的，暴力行动并不是由任何道德考量（moral considerations）激发起来的：

联合性的事业（uniting cause）必定紧随形形色色的具体意愿（particular volitions），以从具体意志中引发共同意志（common will）。职是之故，建立这个整体绝非这个整体中的任何一人力所能及。因此，在实际履行这个理念时，我们只能指望以武力（force）来确立司法环境。在司法环境的强制下，公法（public law）会随后产生。我们几乎不抱希望，能从他那里找到充分的道德意图，诱导他履行公共意志（general will），在把一群野蛮人拢到一起组成了国家后，再去建立合法的宪法。

康德在此与之极力奋战的，正是政治行为的悖论性质。回忆一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考茨基（Karl Kautsky）是如何为多党民主制进行辩解的。考茨基把社会主义的胜利设想为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取得的胜利。他甚至暗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所要采取的适当的政治形式，就是由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政党结成的议会联盟。有些人热衷于无穷无尽地寻找革命成功的“保证”。对这些人，列宁进行了极为刻薄的嘲讽。这种“保证”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社会必然性”之物化，一种是标准（“民主”）的合法性。根据第一种形式，我们不应该冒险，过早地发动革命；我们应该等待正确时刻的到来，就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言，只有等来了那个时刻，形势才会“成熟”。根据第二种形式，

“多数人并没有站到我们一边，所以革命不会是真正的民主革命”。正如列宁反复指出的那样，仿佛革命的行动者在冒险夺取政权之前，应该获得大对体（the big Other）中的某些角色的许可，比如，组织一场全民公决，以便判断，多数人是否支持革命。和拉康一样，列宁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革命总是自己授权给自己的（*ne s'autorise que d'elle-même*）。我们应该采取没有被大对体遮蔽的革命行动。害怕“过早”地夺取政权，寻求什么“保证”，都是害怕革命行动身上的深渊（abyss）。这种恐惧表现在一则轶事之中。就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前，列宁与托洛茨基有一场对话。列宁问：“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的境况会是怎样的？”托洛茨基答道：“如果我们成功了，会发生什么？”即使这则轶事并不真实，它还是耐人寻味的。

甚至某些拉康派人士也在赞美民主，把它称为“大对体匮乏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lack in the Other）。民主制度的实施是有其前提的，这前提便是：没有任何一位政治行动者在取得政权之前得以合法化，政权的位置永远空着，它对竞争保持开放。不过，通过将匮乏制度化，民主压制、规范了匮乏。如此一来，大对体再次成了使我们的行为得以民主合法化（democratic legitimization）的幌子：在民主制度中，我们的行为被视为执行多数人意志的合法行为，因而被“遮挡”起来。与这种逻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解放性力量（emancipatory forces）要做的，不是被动地“反映”多数人的意见，而是创造一个全新的多数。正如托洛茨基所言，革命主体在采取行动时，“不应着眼于静态地反映出来的多数人，而应着眼于动态地创造出来的多数人”。考茨基担心俄国工人阶级“过早”地夺取政权，这暗示了实证主义的历史观。根据这种